

## 文学

# 未完成的文化转型：后苏联俄国文学 20年的三种危机

林精华

【内容提要】作为俄国文化之独特表现的俄罗斯文学，在后苏联突然间失去了近二百年持续存在的强大社会功能，在这次文化转型中出现程度不等的三方面危机，具体包括：文学生产队伍在文学重构过程中出现断裂、当代文学发展过程因为回归文学潮流持续多时而被打乱秩序、由苏联作协转化而来的作家组织变异成利益集团而影响了那些来自苏联作家的文学生产等。诸如此类现象，使得二十年来俄联邦文化重建需要伴随着反文学危机才能走向有序，到目前，这是一个仍未完结的转型过程。

【关键词】后苏联 文学生产队伍断裂 回归文学干扰文学进程  
作家组织功能变异

【中图分类号】I5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2)05-0077-0013

从苏联到后苏联的突然转型，从长时段看，没有超出俄国历史跳跃性变革的一般性规律，是社会进程中的又一次突变，但是，就短时段而言，显然是一次断裂，并殃及文学，使得俄罗斯文学在新阶段的发展是在危机频发的境遇中进行的。

很显然，后苏联俄国文学危机不是单纯的文学生产或文学消费危机，而是国家和社会危机的文化表征，是由于苏联解体同时意味着支撑苏联存在的那套掩盖帝国框架及其历史和文化认同的苏式意识形态一并解体的产物。而包括苏联文学在内的俄国文学则正是帝国意识的延伸（哪怕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业绩，也是得益于以帝国意识去审视现代化中的俄罗斯帝国问

题，从而在理解现代性问题及其表达方式上显示出大国知识分子的风范），伟大文学的存在基础动摇了，文学活动的根基也就需重建。苏联时期那些杰出的文学，无论是国内的主流文学，还是境外抑或地下文学，基本上是围绕社会政治展开的，文学泛政治化倾向成为文学最主要的表现。而后苏联社会重建的最大标志之一则是政治变成了政党、议会和政府的专门领域内行为，作家无法再像在苏联时期那样履行公共知识分子介入政治的职责，自然导致一向与经济关系甚远、与政治关系密切的文学叙述基点的丧失、叙述动力的缺失，国家也不再需要把文学纳入支撑帝国合法性的国家意识形态框架。在围绕政治问题展开文

【作者简介】林精华，俄语语言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90年代以来俄罗斯文学发展》(项目编号: 02BWW006)阶段性成果。

学活动已经不可能的情况下，20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理想的泡沫化、21世纪国强而民不富的经济改革导向，重新形成俄联邦帝国化格局，文学活动更多地成为文化市场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只有满足文化市场需求的文学活动才是有成效的。作家变成独立的文学生产者以后，苏联时代担当意识形态功能的作协，则因支撑其存在的苏共解体而自然瓦解，这原本应该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却因为俄罗斯作家已经习惯于依赖作协，而分裂了的作协实际上已经变成文学生产者的职业行会，它不是召唤作家如何适应新时代变化，而是重建了一个实际上意义极为有限的名利场，并诱惑不少著名作家投入其中，影响了文学的良性发展。此外，苏联末期形成的回归文学，原本对填补从帝俄到苏联文学转型的断裂是非常必要的，但作为一种潮流持续了十多年，不仅直接挤占了当代俄罗斯文学发展空间，而且给人们制造了从苏联到后苏联的转型相矛盾的观念、叙述，使得以此为文化资源的文学生产者和消费者，实际上难以让文学面对现实变革。

总的来说，从苏联到后苏联的转型过程中，文学遭遇两种社会性危机——不同形态的政治干预所造成的文学危机、被强行纳入不成熟的文化市场机制所形成的必然危机，还有三方面属于文学界内部危机：文学生产队伍断裂危机、失去促进文学生产功能的作家组织却奇妙地召唤人们投入其中而阻碍文学健康发展的危机以及回归文学潮流意外引发的危机——回归文学在成为促进后苏联到来的重要力量，弥补中断历史进程的同时，因它不仅和苏联文学所追求的目标正相反，并因其中的白银时代文学、地下文学、境外文学等被大量读者和作者所痴迷，挤占了后苏联俄罗斯文学发展的空间。这些危机，伴随着后苏联社会的进程，使得俄国文学界为了反危机而无法充分考虑文学发展的全球化诉求，从而难以在精神表达、审美表现、价值观呈现等方面顺利融入欧洲世界。反倒因其和国家的整个导向相一致，依旧是欧洲和美国所担忧的对象，这又反过来促使俄国知识界和文学界继续投身到俄罗斯帝国的过去文化中，以图通过对帝国历史的再诠释，为俄联邦国家的重构寻找到思想资源和文化接续发展的能量。这些危机以及由此导致的文化转型中的矛盾，构成

了后苏联文学发展的基本景观，本文着重讨论文学界内部危机，后苏联文学所遭遇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另外行文讨论。

## 一、作家队伍重组：文学生产主体处于结构性危机中

不可否认，后苏联俄国存在着数目相当可观的文学生产队伍，来自苏联的、境外的、新成长起来的。但是，虽然有不少人从事文学创造活动，却未必就意味着文学队伍结构的安全性。按18世纪末以来的俄国文学史经验（和世界文学发展的情形相当），一个时代的文学繁荣程度及其社会影响力大小，和其间作为文学活动过程中最关键因素的文学生产队伍的规模、质量、创造力等密切相关。而后苏联文学自产生伊始，就伴随着社会制度剧变、传统文学体制崩溃、文学生产系统的艰难建立过程，文学生产者就处在危机四伏的状态，不同年龄段的作家不断辞世，既有刚从境外回归的，也有苏联时代人们习惯阅读的，还有前不久才被发现的或者刚刚显露文学才华的，这些人的离去让突然进入陌生状态的俄国文学不知所措：

1994年2月17日，曾任《文学报》主编26年之久，创作了《生命岁月》（1957年）、《我们选择的道路》（1960年）、《遥远的星星之光》（1963年）、《围困》（1969年）、《胜利》（1979年）和《未完成的肖像》（1984年）等一系列著名小说的亚历山大·恰科夫斯基（1913～1994年）去世，享年81岁；

1994年6月17日，以《冬天的橡树》（1956年）而享誉苏俄、以《领袖的爱情》（1994年）而引发争议的苏联著名作家尤里·纳吉宾（1920～1994年）去世，享年74岁；

1994年8月9日，苏联—俄联邦科学院院士和杰出小说家列昂诺夫（1899～1994年）离世；

1995年6月30日，以《一个农艺师的札记》（1953年）和《白比姆黑耳朵》（1971年）等作品享誉苏联的著名作家加夫里拉特洛·耶波爾斯基（1905～1995年）在沃罗涅日去世，享年90岁；

1996年2月10日，获1992年国家奖的老作家沃尔科夫（1900～1996年）去世，享年96岁；

这位被捕、劳改和流放达27年之久（1927～1955年）的贵族出身作家，满怀俄国情怀，其所著《我亲爱的俄国》（1970年）、《希望和灾难的世纪》（1989年）在当时催人泪下，在后苏联更使人感慨万千；

1997年4月4日，弗拉基米尔·索洛乌欣（1924～1997年）这位先后以《发自俄国博物馆的信》（1966年）和《阅读列宁著作》（1989年）等震动苏俄的作家离世；

1997年6月12日，苏联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阿纳托利·博恰洛夫（1922～1997年）去世；第二天，为苏俄读者普遍喜爱的诗人布拉特·奥库扎瓦（1924～1997年）去世；

1998年7月23日，创作了《不单是面包》（1956年）、《穿白衣的人们》（创作了20多年，直到1987年问世）的杰出作家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1918～1998年）去世；

1998年12月23日，以《司机》（1950年）获斯大林奖、以《阿尔巴特街上的孩子们》（1987年）震动后苏联的著名作家雷巴科夫（1911～1998年）去世；

1999年9月30日，著名文学研究家和俄罗斯文化史学家利哈乔夫院士（1906～1999年）去世；

2000年4月19日，很早以《在额尔齐斯河上》（1964年）出名、1986年接手《新世界》而开启回归文学浪潮，并且创作了《生态小说》（1993年）和《选择的自由》（1996年）等作品的德高望重作家谢尔盖·扎雷金（1913～2000年）去世，享年87岁；

2001年10月25日，著名作家彼得·普洛斯克布林（1928～2001年）去世，享年76岁；

2001年11月29日，以《鱼王》（1976年）而著名的维克多·阿斯塔菲耶夫（1924～2001年）去世，享年77岁；

2001年12月7日，以《坦克呈菱形推进》（1963年）成名并曾任《十月》主编的著名小说家安纳托利·阿纳尼耶夫（1925～2001年）去世，享年76岁；

2006年5月10日，以撰写10部社会学小说而享誉国际的逻辑学家和小说家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1922～2006年）去世，享年84岁；

2008年8月3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

仁尼琴（1918～2008年）去世，享年90岁；

……

这些文坛宿将一个个离去，给社会尤其是那些有苏联生活经验的读者，带来难以诉说的感伤，似乎诉说着孕育许多文学名家的时代，随着制度终结而去，随着文学巨匠的离世而真正消失，他们带走了对苏联的情怀，也可能使真诚关怀当下社会的知识分子情怀随风而去。更重要的是，一些六十岁左右，甚至更年轻的作家，非正常地相继离世，不仅一次次给文坛带来感伤，还一次次产生震撼力、冲击力：

1991年11月著名诗人德鲁尼娜（1924～1991年）自杀身亡；

1992年4月30日，曾经以中篇小说《狐狸的智慧》（1986年）和长篇小说《在蓝色天空下》（1985年）而著名的小说家谢苗诺夫（1931～1992年）去世，年仅61岁（此后《新世界》和《大陆》杂志还时常发表其遗作）；

1992年7月30日，以《马雅可夫斯基的复活》（1985年在慕尼黑出版）而著称的诗人和小说家尤里·卡拉布奇耶夫斯基（1938～1992年）去世，年仅54岁；

1993年1月25日，曾经因《存在》（1982年）和《身份》（1984年）而获苏联国家奖（1987年）的著名诗人叶甫盖尼·维诺库罗夫去世，享年不过68岁；

1993年2月，曾任《旗》主编和《文学报》主编的诗人尤里·沃洛诺夫（1929～1993年）去世，享年64岁；

1993年7月曾敏锐指出苏俄文学发展问题的著名批评家拉克申（1933～1993年）去世，年仅60岁：他是满怀期待投入改革（戈尔巴乔夫后期被任命为《外国文学》主编），但发现改革在葬送自己和苏联，就抑郁而疾；

1993年9月15日，以《春天的17个瞬间》（1970年）而著称的苏联侦探小说家尤里安·谢苗诺夫（1931～1993年）在巴黎去世，年仅62岁；

1993年9月24日，曾经以《萨什卡》（1979年）而一举成名的作家维亚契斯拉夫·康德拉季耶夫（1920～1993年）绝望自杀，虽然他在改革年代发表的《发生过的事情》（1988年）和《用鲜血洗罪》（1991年）仍旧被读者所热衷；

1994年4月30日，出生于乌克兰并参加卫国战争，以《战争》（1970～1980年）、《莫斯科—41年》（1985、1989年）而著称的小说家伊凡·斯塔纽克（1920～1994年）意外去世；

1994年8月8日，以《城市之声》（1977年）和《210步》（1978年）而著称的政治抒情诗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1932～1994年）去世，年仅62岁；

1994年10月，曾任《文学俄国》总编的著名小说家恩斯特·萨夫诺夫（1938～1994年）去世，年仅56岁；

1994年12月27日，因发表很有见地的政论、1987年被调任《共产党人》杂志评论员的批评家伊戈尔·杰德科夫（1934～1994年），郁闷而逝，年仅60岁；

1995年3月26日，因长篇小说《我们使地球适合居住》（1973年）而被迫流寓西方、在巴黎创办境外杂志《大陆》的作家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夫（1930～1995年）去世；

1998年2月14日，以《莫斯科的教堂》（1988年）、《哥萨克的坟墓》（1990年）和小说《不，是的》（1995年）等而著称的青年作家彼得·帕拉马尔丘克（1955～1998年）去世，年仅43岁；

1999年10月7日，苏联时代身份是儿童诗人、后苏联人们发现其实他还是杰出的地下/境外后现代主义诗人的根内赫·萨帕吉尔（1928～1999年）去世；这个月末，《青年近卫军》主编、著名小说家科罗托夫去世（1946～1999年），年仅53岁；

2001年1月25日，苏联时代已经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瓦季姆·科日诺夫（1930～2001年）去世；

2001年5月5日，出类拔萃的诗人雷日（1974～2001年）在叶卡捷琳堡自杀，年仅27岁；

2005年12月，毕业于医学院的外科医生、被视为天才的著名小说家拉普京（1958～2005年）被人袭击身亡，年仅47岁；

2007年6月16日，莫斯科观念主义艺术奠基人普里戈夫（1940～2007年）去世，享年67岁；

……

可以说，无论是因自然年龄而正常走完生命旅程，还是由于社会剧变，大量作家和对文学创作有巨大作用的批评家、学者失去了生活信念而辞世，总之，人们熟悉，甚至深感亲切、怀有敬

意的作家一个个离去，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集中离去，可谓后苏联俄国文学发展中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和十月革命后许多人流寓境外不同——他们还在侨居地创作，并且更顽强地延续着俄国文学的生命），给一些健在的有苏联阅历和苏联情结的作家以巨大的精神冲击。

实际上，文学生产队伍更因为时代巨变，改变了生产主体结构，不同于十月革命后大批作家被迫离境，留在境内的或沉默，或转向，新出现的草根阶层作家替代了贵族作家，文学发展正常延续被代之以转型，后苏联突然得到了苏联时代渴望的自由，反而使文学界失去了文学活动的目的，即文学不再需要争取言论自由的表达，无论是那些来自地下/境外出版物的非主流文学家，还是那些在合法出版物上发表作品的著名作家，都无法再传承作家的使命——经由文学表达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怀，来自不同方向的作家分别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其中，来自苏联的作家们，无论是60年代作家，还是70～80年代成名的作家，若不放弃苏联的思维方式和诗学，再无法从事文学生产，这就导致绝大多数苏联时期著名作家基本上停止创作了。典型者如热衷于作协事务和政治纷争的邦达列夫，近20年来除了《勿抗恶》（《青年近卫军》1994年第10期和1995年第10期）以及被批评界诟病良多的《百慕大三角》（1999年）和《没有仁慈》（2004年）等之外，少有优秀作品问世<sup>①</sup>；2007年出版的《邦达列夫文集》收录的仍然是《营请求火力支援》、《岸》、《舞台》和《选择》等他在苏联时代创作的作品。这位曾在苏联时代获得两次国家奖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奖的著名作家，在后苏联除了荣誉性的托尔斯泰奖和肖洛霍夫奖之外，再没有获得任何有影响力的文学奖，甚至为《民族友谊》年度奖发生争执。而别洛夫（1932～）这位1956年就成为苏联作协成员、1981年获得国家奖的苏联著名作家，在苏联解体以后开始热衷于作家组织活动，期望作协改变文学危机状态，殊不知作协已经瓦解成不同利益集团，充分地社会化了，基本上不能为作家

<sup>①</sup> 瓦西连科在《读者需要邦达列夫的新小说吗？》一文中（载《青年近卫军》1995年第10期）批评说，作家为了迎合新生读者，创作了这种使传统读者失望、新时代读者又不接受的作品。

的精神自由和言论自由担当责任，20年来除了发表默默无闻的《俄罗斯北方的日常生活》（2000年）之外，毫无文学建树。以上情况并非个案，大多数健在的曾获苏联时代国家奖的作家大多如此。

至于有些苏联时代著名作家在后苏联继续活跃，多得益于他们脱胎换骨的转变。其中，像20世纪50年代就以剧本《冠军》（1955年）和《他者的护照》（1957年）等闻名的剧作家佐林，在后苏联时代之所以还创作出了《莫斯科庄园》（1995年）、《转述》（1996年）、《狂人》（2000年）、《错字》（2001年）等许多成功之作，并先后上演，是因为他彻底放弃了苏联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化，而着力于描写日常生活现象。而老作家拉斯普京之所以在后苏联时期成功推出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如《谢尼亚上路了》（1994年）、《青年俄国》（1994年）、《在西伯利亚的一座城市里》（1994年）、《女人间的谈话》（1994年）、《邻里之间》（1995年）、《住院》（1995年）、《下葬》（1995年）、《祭日》（1996年）、《傍晚》（1997年）、《突如其来》（1997年）、《幻象》（1997年）、《新职业》（1999年）、《农家木屋》（1999年）、《在故乡》（1999年）等，以及长篇小说《伊凡的女儿，伊凡的母亲》（2006年），是因为他在苏联末期就及时地深刻反思苏联文学的叙述，开始推崇俄罗斯人的历史情怀，在创作中强化自己的斯拉夫传统道德情怀——这正是后苏联重建所需要的民族认同根基，他的《下葬》和《住院》因为明显表达回归传统的愿望而赢得了“莫斯科—彭内”国际文学奖，充满着斯拉夫历史感的《木房》同样被著名评论家邦达连科评为这一时期传统散文领域最有价值的作品<sup>①</sup>，《活着且要记住》则被著名导演普罗什金拍成电影（2008年）。整体上，这类作家在数量上是少之又少。

归侨作家或从地下浮出地面的苏联时代作家情况复杂些：20世纪90年代，他们填补了文学队伍断裂的空缺。拉特·奥库扎瓦的《被禁止的演出》、侨居德国的弗拉基莫夫的《将军及其部队》（《旗》1994年第4～5期）、阿佐利斯基的《笼子》（《新世界》1996年第5期）等分别赢得1994、1995、1997年布克奖，但人们对他们褒贬不一，有人批评他们的创作是过时的，不应该得奖<sup>②</sup>。阿克肖诺夫和索尔仁尼琴仍有巨大的影响力。索尔仁尼琴

因激烈的帝国话语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身份，成为后苏联最负声望的知识分子，而国籍仍属于美国的阿克肖诺夫则成为创作量巨大的作家，包括《莫斯科传说》（1993～1994年）、《正面人物的底片》（1996年）、《新的诱人风格》（1997年）、《来自摩洛哥的橙子》（2000年）、《剖腹产术》（2001年）、《美国的基里尔文字》（2004年）、获得2004年布克奖的《伏尔泰的男女信徒们》（《十月》2004年第1～2期）、《十年污蔑》（2004年）、《莫斯科，科—科》（Москва, ква, ква）（2006年）、《一直在销售》（2007年）和《稀有土地》（2007年）等，因作品不断以怀旧情怀追述俄国历史、创造性解释当代问题，其本人又被视为最有成就的作家。然而，大部分作家则因为那个批评对象——苏联不复存在，文学发生的动力就大大消失了。此前有境外/地下刊物不计成本的支持，现在这些刊物已经合法化，成为文化市场的一部分，需要面对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因而靠文学生存的境遇更艰难（彼托夫的《地下人，或当代英雄》写出了这类作家在后苏联的悲惨命运）。进入21世纪以后，苏联已从一个需要斗争的对象变成了怀旧的对象，广为流行的历史文学，或是关于苏联名人的叙述，或者是对所经历的苏联重大事件的再叙述，而这些是需要相应经验的，更多的归侨作家或苏联时代的地下作家，因其身份所限，是无法加入这种文学结构中去的，这些人即便还有作品问世，也难以产生社会效应了。

有意思的是，一些在苏联后期就默默无闻的过时作家，却因为苏联已经成了不可复原的过去，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苏联成为怀旧对象还会被人重新怀念。

从苏联到后苏联的剧变，后苏联文学队伍出现重构性的危机：一个个声望赫赫的作家或者才华横溢的作家相继离去，且辞世人数众多，这就不单是生命的自然更替，而是严重影响了文学的正常传承、有序发展、自然延续；更多存留下来的苏联著名作家或归侨作家，则因为意识形态的开禁及其所带来的民主制度以及不成熟的市场经济

<sup>①</sup> [俄]弗·邦达连科：《文坛十杰——新千年俄罗斯文坛评说》，载《俄罗斯文艺》2002年第3期。

<sup>②</sup> Алла Лагынни, Сумерк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2001, № 47.

济,尤其是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艰辛,反而失去了文学生产的根据,或者放弃了继续追求文学,或者因挥之不去的苏联情怀消磨了创作意志,少有出色产品问世;与此同时,由于大部分读者来不及调整文学观念,或者有些新成长起来的作家、从苏联时代转化来的作家、来自境外/苏联地下的作家没有及时更新文学观念,导致社会大众没能广泛熟识、接纳这些作家,这也增加了后苏联文学危机。

## 二、回归文学:当代文学发展的正常秩序反而被打乱

后苏联文学事实上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实行的“公开性”和“民主化”浪潮中开始的:这个浪潮开启了剧烈的意识形态纷争,并且不断升级,成为后苏联到来的关键性因素——在体制内进行改革已经使苏联很难再存续下去,后苏联时代事实上提前到来。在后苏联时代到来过程中,以及到来后一段时间,恢复俄国历史原貌成为政府的工作、社会的共同呼声、知识界的任务。在1986年第八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著名作家格拉宁呼吁重新评价20世纪20年代大批被遗忘的作家,诗人沃兹涅先斯基主张出版扎米亚京、霍达谢维奇、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人全集和文集,国际著名的人文学者利哈乔夫认为应该把20世纪俄国文学从西方收回来,苏联档案学院院长尤里·阿法纳西耶夫连续发表《历史学的任务》(《莫斯科新闻》1987年第2期)、《从真理和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苏维埃文化报》1987年3月)等文章主张出版那些被禁的知识分子作品,还原历史真相,真正践行现实主义原则。而叶莲娜·楚科夫斯卡娅之作《让索尔仁尼琴回归成为苏联公民》(1988年8月5日《书评报》)强调苏联出版这位作家作品的多方面重要性。由此,切实启动苏联拨乱反正(大批人物被平反昭雪、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被正名),也由此促成被苏联所限制和压制的文学、哲学、历史、传记等作品,包括十月革命后被驱逐出境和被禁止的19~20世纪之交各种知识分子及其不同文类文本组成的白银时代文学,20世纪50~60年代、20世纪70~80年代两次移民潮中被迫流寓国外的侨民知

识分子文学和哲学,苏联时代不被承认的地下文学等,在还原历史面貌的潮流下,不断被翻检出来。换句话说,伴随批判、否定苏联的过程,出现了不断发表、阅读、讨论被苏联否定的各种文本的热潮。出版界热衷于出版这类作品,文学界和批评界感兴趣于这类作品,教育界甚至让它们走进讲堂、进入教材。这便是众所周知的“回归文学”(возвращ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浪潮。在这个浪潮中,不同时期被查禁、流亡出去的任何一位比较重要作家及其作品,皆重见天日,甚至不止一次再版,成为各大杂志、各出版社、读者最热衷的作品,正是这些历史的作品替代了当代文学。其中,索尔仁尼琴作品重见天日的情景显示出历史的文学在当代的魅力:

《新世界》1989年第8~11期连载索尔仁尼琴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1981年);

《星》1990年第1~12期连载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1914年8月》(1981年);

《我们的同时代人》1990年第1~12期连载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1916年10月》(1982年);

《涅瓦》1990年第1~6期连载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1917年3月》(1986~1987年);

《新世界》1990年第1~5期连载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第一圈》(В круге первом, 1968年);

《新世界》1990年第6~8期连载索尔仁尼琴长篇小说《癌病房》(1968年);

《新世界》杂志1991年第6~12期连载索尔仁尼琴长篇小说《牛犊抵橡树》(1976年)。

苏联虽然在冷战时代就加入了国际版权组织,但实际操作层面是没有版权概念的,因而大型杂志长篇累牍地连载索尔仁尼琴的各种作品,各种出版社接着再版这些作品,《第一圈》于1969年由纽约“哈珀与摇”(Harper & Row)出版社、巴黎“基督教青年会”(YMCA)出版社推出后,1989年以来又先后出版了30个版本,包括1990年莫斯科新世界中心、莫斯科现代人出版社、莫斯科文学艺术出版社、萨拉托夫地方出版社等5个版本,1991年莫斯科全景出版社等推出4个版本,2006年由“埃克斯莫”(ЭКСМО)出版社和“奥尔玛”(ОЛМА)出版社等推出8个版本。由此可见,不只是被称为“索尔仁尼琴年”的1990年,其作品得到了大量出版,在其他年份也如此,即使有这

么多再版版本，莫斯科“时间”（Время）出版社2007年还是推出了其30卷本全集。《我们怎样安排俄国？》一经刊出（1990年9月18日《文学报》），马上就被《共青团真理报》等主要媒体纷纷转载。

何止是索尔仁尼琴，苏联时期无论是以何种理由被限制的作品，都得到大规模的回归。具体说来有：

20世纪50年代末解冻思潮促使下已经有过第一次回归经历的作家，包括19~20世纪之交就被禁的那批著名作家，如布宁、左琴科、阿赫玛托娃、布尔加科夫等人的作品；斯大林时代被禁止、解冻后放禁但后来不再重版的普拉东诺夫的《地槽》（《新世界》1987年第6期）和《切文古尔》（《民族友谊》1988年第3~4期）以及扎米亚京的《我们》（《旗》1988年第4~5期）等经典，此时有了第二次回归。

尤其是白银时代的几乎每一位作家，无论是流亡出境的，还是滞留在苏联的，包括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皮乌斯夫妇、索洛古勃、安德烈·别雷、扎伊采夫、列米佐夫、布宁、霍达谢维奇、什梅廖夫等人全部重要作品，如梅列日科夫斯基三部曲《基督和反基督者》与《野兽王国》、重要理论著作《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果戈理与魔鬼》等，安德烈·别雷作为俄国最为激进的象征主义文学家之《交响曲》、《银鸽》、《彼得堡》等叙事性文体和《世纪之交》、《世纪之初》、《两次革命之间》回忆录等，以及别尔嘉耶夫《共产主义的起源与思想》、费多托夫《俄国与自由》、弗兰克、罗赞诺夫等人的大量哲学著作，先是被一些大型文学杂志不计篇幅地连载，此后以单行本、丛书、文集、选编等各种方式不断被整理再版。被历史埋没的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在20世纪80~90年代之交被重新建构，其作为历史文学现象在文坛上持续占领文坛主潮超过十年之久！

超出解冻思潮限度的作家作品，以及第二代、第三代侨民作家之作和境外文学（作者有可能在苏联，但在国外发表作品），除《日瓦戈医生》（《新世界》1988年第1~4期），包括约瑟夫·布罗茨基、瓦西里·阿克肖诺夫、沃伊诺维奇、谢尔盖·多弗拉托夫、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萨沙·索科洛夫、伊姆勃利斯基等移民作家之作，如西尼亚科夫斯基的《和普希金一道散步》、《在

果戈理的阴影里》等，萨沙·索科洛夫的《傻瓜学校》、《在狗和狼之间》、《帕利桑德里亚》等，弗拉基米尔·沃伊洛维奇的《大兵伊凡·琼金的生平和传奇》（1963~1975年）、《反苏维埃的苏联》（1985年）等后现代主义作品，以及格罗斯曼的《生存与命运》、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记忆权力》、杜金采夫的《白衣》、特里丰诺夫的《消失》等境内作家的作品都在此时于苏联面世。其中，曾因编辑《大都会》文集而被迫流亡到美国的阿克肖诺夫，在苏联解体以后其境外创作的所有作品皆得以回归，如《青春》杂志1989年第6~7期连载其《我们的金色铁路》（1973年）、第二年第1~5期连载《克里木岛》（1980年），杂志《旗》和《青春》分别在1990年第7~8期和第5~11期连载了阿克肖诺夫的《蛋黄》和《莫斯科史诗》等作品。

20世纪70~80年代创作但被禁的先锋派（后现代主义）作品，包括维涅吉科特·叶洛费耶夫、B.涅克拉索夫、霍林、萨普吉尔、普里戈夫、鲁宾斯坦、日丹诺夫、叶列缅科、施瓦茨、帕尔什科夫和萨杜尔、利蒙诺夫等人的作品也先后重版。《乌拉尔》、《达乌加瓦花》和《泉水》等杂志，也因出版了许多地下文学专刊赢得更多声望；1978年由美国安·阿尔波尔（An Arbor）的“阿尔迪斯”（Ardis）出版社刊行的安德烈·彼托夫的长篇小说《普希金之家》，1988~1999年间在俄国出了9个版本，而维涅吉科特·叶洛费耶夫的《莫斯科—彼图什基》，1990年出现第一个版本，到2000年共重版了9次。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正是在这样的风潮中，那些曾经被禁的许多普通诗人和小说家之作，在后苏联被不断重新发现。

如今已是后苏联最杰出批评家的爱泼斯坦当时就在《文化—文化学—跨文化》（1988年）中敏锐指出，在俄国语境下，作为文学事实的当代俄国文学，不能狭义地理解，此前所有未知晓或未发现的俄国和世界文化的任何方面皆属于当代范围，“当代就是某种事件已经发生并仍发生影响的时间。对我们今天的俄国人而言，早期基督教时代比起启蒙运动时代更为当代。因为我们是这一时间的后面，对我们而言，当代边界扩展其自身到包括整个世纪，一个迄今仍未阅读索洛维约夫和尼采的世纪；包括一个半世纪，期间出

现了我们不熟悉的恰达耶夫和霍米亚科夫、克尔凯戈尔和谢林；甚至追溯到把我们同我们自己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分离开来的一两千年之前；当代从不是从前，更是我们时代本身，我们未与时俱进并且没有赶上时代”<sup>①</sup>。这意味着，后苏联文学不仅包括后苏联作家创作的文学，还包括后苏联读者第一次阅读到的被苏联当局查禁的过去的那些作品。文学史家切尔内克称，“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空间中，特别显著的标志是，回归俄国并在俄国出版的B.纳博科夫、E.扎米亚京、A.普拉东诺夫等人作品添列其中并持续产生影响力。20世纪60~70年代被苏联查禁、却在西方出版或在苏俄地下出版物出版的作品，包括安德烈·彼托夫的《普希金之家》、瓦西里·阿克肖诺夫的《灼伤》、格奥尔基·弗拉基莫夫的《忠实的鲁斯兰》、维涅吉科特·叶洛费耶夫的《莫斯科—彼图什基》、伊斯康德尔的《桑德尔》，它们成了当代文学”<sup>②</sup>。

不可否认，这样做非常必要，且很有意义，这类回归文学的意义必须被充分估计：在相当程度上还原了历史的复杂面貌，许多被遗忘文本被重新发现，改写了苏联官方所建构的文学史，提高了人们的阅读能力，改造了苏俄读者结构，给当时和后来的知识分子理解俄国和苏联提供了深刻的思想资源，促进了人们思想解放等。如别雷回忆录三部曲和白银时代作家各种回忆录、叙事散文、书信，使人们有可能建构一套完全不同于苏联文学史家和文化学家所确定的19~20世纪之交俄国文化史，并借助这些新的史料、新的认知框架，加剧颠覆苏联对十月革命的描述；在社会政治和文化危机不断、人们无所适从的情形下，加剧了人们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不信任，如柳德米拉·阿列克谢耶娃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史》（1984年在美国国会资助下出版），1992年在俄罗斯公开发行人后，因其系统描述俄国各族裔的、宗教界的、世俗社会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包括文学艺术，成为持续热销读物，召唤了人们对苏联问题的深入关注。此类出版物促进了后苏联文学的到来，按罗德良斯卡雅所论，回归文学改变了甚至摧毁了苏联的审美基础，恢复了被遗忘了的诗学创造的永恒使命，经由过去给定的声音、文字和思想战胜苏联生活<sup>③</sup>；尤其是大

大提升了人们认识俄罗斯问题的思维方法，确立了新的文学标准，给后苏联重建提供了民族认同、民族主义和帝国意识坚实的资源。

然而，正因为这些历史上“被禁止的文学（запрещ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书桌文学（литература письменного стола）”，潮水般地涌到苏俄读者面前的回归文学，在相当程度上成了文化市场上最重要的“当代文学”，持续成为知识阶层最热衷的读物、批评界讨论最多的作品，在1989~1995年间占据了那些大型文学杂志的绝大多数版面和出版社的出版计划、书店中的主要位置，客观上使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的当代文学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严重受挫，挤占了出版份额和读者市场，大大限制了后苏联青年作家的成长，他们的创作很少有机会被及时刊载出来，这一时期几乎没有推出过当代诗人的诗集，虽然出版总量实际上是大幅度上升<sup>④</sup>。历史文学替代当代文学的现象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此后仍在不同程度地延续。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加尔科夫斯基，于1985~1988年创作了巨型文学哲学文本《无尽头的死胡同》，他本人曾在《我们的同时代人》任职过编辑，创作完成后，该作品仅在《我们同时代人》1992年第1~2期、《新世界》1992年第9~10期发表了片段，虽然发表的片段还引起了《文学报》、《独立报》、《莫斯科》杂志和《接班人》杂志等跟进展开热烈讨论，如杰出的批评家科日诺夫在《我们的同时代人》（1993年第1期）撰文称“该书如此大胆和自由，现在要出版它不容易。然而，我相信，其问世不仅是俄国，而且也是世界文学界和哲学领域的大事”，著名批评家根尼斯甚至在《莫斯科新闻》上（1993年12月19日）说该作是俄国的、苏联社会主义的《尤利西斯》，但其最终却是由作家本人于1997年创立地下出版物出版社后才得以面

① Mikhail Epstein, *After the Future: the Paradoxes of Postmodernism and Contemporary Russian Culture*.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5, p.7.

② Черняк М.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процесс (90-е годы) // Тимина С., Черняк М., Кяшто Н. (сост.),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X века в зеркале критики*. М.: Академия, СПб.: СПбГУ, 2003, С.22.

③ Роднянская И. Назад-к Орфею! // *Новый мир*, 1988, № 3.

④ See Ian K. Lilly & Henrietta Mondry (eds.), *Russian Literature in Transition*. Nottingham: Astra Press. 1999, pp.6-7.

世，哪怕这部由949个相互循环的注释构成的奇特文本完整本，一出版就于当年获得了“反布克奖”。因为几乎所有出版社都只热衷于回归文学。反过来，这些迟到的作品，在后苏联不断获得各种文学奖，吸引了社会和读者的关注，又帮助延续了当代读者偏离当代作家所生产的文学产品的现象。

白银时代文学和哲学、20世纪不同时期的境外侨民文学，经过20年来的不断再版和讨论，成为不可动摇的苏俄经典、20世纪俄国文学中最重要的成就，以至于那些大型文学杂志的文学批评栏目刊文时常讨论的仍是这些活跃在当下的历史现象，如《旗》杂志2008年第2期还在发表舒宾斯基的《游戏者和用来游戏的》讨论20世纪60~70年代布洛茨基等列宁格勒诗人的诗歌语言问题，而这些人当时是被官方否定、批评的。姑且不论这些回归文学包含着的严重的反苏联冷战色彩及其效力，就苏俄知识界按先入为主的西方意见来阅读、理解，也足以造成后苏联俄国人在审美观上的混乱。如此一来，就相应地遮蔽了当代读者对当代文学问题认识的视野，并以白银时代文学、侨民文学、地下文学等作为知识分子思想和风范的标准，有意无意地降低后苏联文学的成就，并因推崇这些回归文学文本的文字表述深度和思想力度，使之成了讨论俄罗斯问题的标准，并因是苏联主流作家所不及的，也是后苏联成长起来的大部分作家所欠缺的，进一步造成当代文学遭遇同时代人所确立的经典的挤压。

可见，历史的文学，经由回归文学浪潮的推动，变成了后苏联俄国的当代文学，不仅成为后苏联时代社会最畅销的重要文本，从作品出版份额和读者选择读物上挤占了当代作家的空间，造成当代文学生成空间的萎缩，意外地成了对后苏联文学正常进程的干扰，使这个时代的许多文学青年失去了成功的机会，他们或者即便有机会发表作品，被关注的机会也会受限，而且改变了当代读者的阅读趣味，让人们更热衷于上个世纪之交的文学，而不是这个世纪之交的文学发展。

### 三、作协分化而来的作家组织： 文学界自我加剧文学危机

认识苏联文学是回避不了1934年成立的苏联

作协问题的。作协之于苏联体制性文学，在苏联文学发展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既是文学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组织者，又成为文学活动本身，决定着绝大部分作家文学活动的主要过程（包括出版、评价、反应等），基本上只有苏联作协成员才能在大型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作协几乎百分之百地控制图书市场，它成就了苏联的大部分文学，并经由文学有效地形成了苏联认同，在具体文学表述上有意识去担当斯大林所说的“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责任，同时进一步促成了苏联时代的“俄罗斯问题”的日益僵化，还分化苏联时期俄国文学为境内、境外、地上、地下。然而，在苏联解体之前、后苏联到来之际，苏联作协已经开始分解成不同的组织，这些组织在后苏联重建过程中持续活跃着。如此一来，观察后苏联文学，客观上就要考虑作协对后苏联文学产生和发展的影响问题。著名军事题材文学家邦达列夫作为苏联作协后期领导人之一，在后苏联时代还为其所在的俄国作协及其正统性、地位和权益等持续争斗。是作协之于后苏联文学仍旧很重要，使得一批文学工作者为之奋斗，还是他们自认为很重要而为作协奔波？

苏联作协表面上是作家的民间组织，实际上是苏共领导在文学领域的延伸，姑且不论这种延伸的复杂性和具体作用，仅就作协本身的存在而言，其在二战之后实际上已经成为庞大的行业协会和利益机构：苏联作协成员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达到上万人（各加盟共和国作协成员更多），这些成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拿着高薪水的“专业作家”；作协领导根据意识形态的有关条文决定哪些人能成为苏联作家，控制着作协成员的文学生产量，监管着文学生产的各环节，按当代著名批评家楚普林的说法，苏联作协领导就是文学的总指挥——要制订文学生产计划并进行管理，这样的组织是完全可能按自己的意志对作家进行自由派文学和保守派文学、民主派和爱国派的分类的，以便更好地排除异己<sup>①</sup>；这些享受很高待遇的文学组织者本人，借助作协领导位置，同时成为文学权威但包括邦达列夫和恰科夫斯基等在内的

<sup>①</sup> Quoted Deming Brown, *The Last Years of Soviet Russian Literature: Prose Fiction 1975-199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

作家，他们在成为苏联作协领导之后，就再少有重要作品问世。在苏联解体前后的一段时间按维克多·叶罗菲耶夫的话说，90%的专业作家几乎都从事与文学无关的工作，而是做着在国家基础消失过程中静悄悄改变作协意识形态功能、使之具有商业性质的工作，以至到1994年各种作协中真正以文学为业的作家不足50人；苏联作家稿酬的10%由作协的文学基金会管理，作协及其基金会有自己的疗养院、医院和其他很多不动产，掌控着许多大型文学杂志、重要出版社。虽然作为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苏联作协这种制度理论上应该随着苏联瓦解而自动取消，但它却奇特地存续下来并试图再次活跃起来。

1958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经苏联作协同意成立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作家协会，即俄国作协（союз писателей России=СПР），1985年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С.米哈尔科夫为主席、邦达列夫为副主席。1991年9月苏联作协第八次大会通过决议，声明俄国作协是苏联作协在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法定继承人，苏联作协的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成员要重新登记，理事会主席为邦达列夫；1994年6月俄国作协第四次大会选举《长篇小說报》（Роман-газета）主编加尼切夫任主席，В.别洛夫、马士巴什、普罗斯库林、拉斯普京、瓦连京·索罗金等任联合主席，2004年成立创作委员会（С.米哈尔科夫和М.阿列克谢耶夫任主席）。也就是说，在后苏联到来后，这个作协很自然地成为苏联作协 and 苏联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作协的合法继承人，吸纳了苏联主流作家中的大多数，且是苏联时代相对坚持俄罗斯传统的一些作家，虽然被另一些人诟病为保守派或爱国派。此乃通常假定的俄联邦作协（尽管实际上至今没有一个这样的统一作协），2004年时它有地方分部93个，成员近7000人。

可是许多作家并不承认这个组织，1990年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和阿斯塔菲耶夫等18位作家发起成立“独立作家联盟”，反对苏联作协和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作协。1991年7月3日《文学报》刊发《成立独立作家联盟宣言》，声明其目的是为了表达文学家的创作独立性，明确区别于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作协和苏联作协，是独立的作家协会。阿列斯·阿达莫维奇、斯韦特兰娜·阿

列克塞维奇、玛格丽特·阿里格尔、阿纳多利·阿纳尼耶夫、巴克兰诺夫、达吉扬娜·别克和安德烈·彼托夫等著名作家在宣言上签名。1991年10月21日，这些倾向于自由创作的民主派作家，举行了成立独立作家组织“俄国作家联盟”（сою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СРП）大会，自称是团结俄国和境外文学家（小说家、诗人、散文家等）的全俄社会组织、俄国作家的协会，总计有作家3500名，包括创始人利哈乔夫院士、扎雷金、阿斯塔菲耶夫、纳吉宾、日古林、弗拉基米尔·索科洛夫、罗曼松采夫等，М.杜金、佐洛图斯基、В.卢基扬诺夫、Н.索恩采夫、什科廖列夫斯基、М.尤赫马等人被民主选举为联合主席。著名作家叶甫图申科、伊斯康德尔、阿赫马杜琳娜、彼托夫、马卡宁、楚宏采夫、库拉耶夫、库巴兰诺夫斯基、库舍内尔等为成员。2009年6月24～25日举行了第四次总结会，库拉耶夫、库巴兰诺夫斯基、库舍内尔、列菲尔、季托夫等被推选为联合主席，小说家和诗人瓦西连科任理事会第一书记。

1992年4月，由俄国作协组织的试图延续苏联作协代表大会的作协国际共同体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在即，91岁高龄的老作家列昂诺夫致信祝贺，但贝科夫、В.康德拉季耶夫、瓦西里耶夫、格拉宁和伊斯康德尔等俄国作家联盟成员发表《致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的公开信》，批评并拒绝接受筹委会及其提案，邦达列夫、克鲁平、拉斯普京等俄国作协成员则发表了《代表大会将判断孰是孰非》对公开信进行反驳，强调由“俄国作协”组织的作协国际共同体大会具有延续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合法性。1992年5月14日第四次前苏联地区作家代表大会举行，分布在这些地区的37个作家组织赴会，大会宣布成立“作协国际共同体”（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писательских союзов / МСПС）并作为苏联作协法定继承者，代表着6404名作家（其中俄联邦作家4314名、独联体地区其他国家作家2090名）的利益和俄语文学发展趋向，由“俄国作家协会”和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鞑靼斯坦的作协组成联合执委会和主席、监理会，并发布宣言说，共同体是苏联作协的合法继承人，可从法律上保证作家的创作，是作家的公民权利、社会权利和职业权利的保护者，有权继承苏联作

协的各种物质和经济遗产（包括基金会资金、动产和不动产），只有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举行之前加入共同体的作协才能分享这些财富；宣言还声称，“‘俄国作家联盟’是自给自足的官僚机构，完全是孤立和被隔绝的，割断了俄罗斯作家与独联体其他作家的关系，处境困难，但俄国和独联体的作家组织不是这样”<sup>①</sup>，俄国作家联盟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会议期间，针对盖达尔政府试图把作协财产收归国有的决定，共同体进行了抗争，有些作家到苏联作协所在地抗议政府决定。当时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哈斯拉托夫致信盖达尔，希望他重新考虑苏联作协财产国有化的决定，“撤销这个决定，让文学家们安心工作！”，而盖达尔回函说已经成立调解委员会。1998年5月俄国作协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虽然论及后苏联俄国文学发展、各族裔文学，但关心的重点是作家的生活状况和作品出版问题。在作协国际共同体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俄国作协主席加尼且夫呼吁俄国作家团结起来，希望作家联盟和俄国作协能够合作，却未得到积极回应。2000年底俄国作协第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召开，重申要采取紧急措施把原苏联作协财产收归俄国作协，并致函总统、杜马主席和政府总理，请求立即切实支持这一要求，并希望政府对自由派和传统派刊物一视同仁。2001年5月之前《文学报》支持西方派，尤里·勃廖科夫主编该报后，就尝试重新统一和团结这些作家组织，仍未果。2002年初（1月30日至2月5日）《文学报》刊发一封呼吁这两个作家组织团结起来的公开信，署名的是作协国际共同体主席谢尔盖·米哈尔科夫和《文学报》、《文学俄国》、《小说报》等报编辑，以及《苏维埃作家》出版社总编。尽管许多人同意这样做，并认为这种通过壮大声音的举动有助于捍卫作家的各种利益。但是，合并的提议分别被两个作协拒绝。拉斯普京坦言，进入和叶甫图申科与尤里·车尔尼钦科同属一个联盟的作家组织是难以想象的。更有甚者，作协国际共同体向法院控告作家联盟侵占了应该属于他们的苏联作协遗产，2006年12月莫斯科仲裁法庭宣布作协国际共同体无权收回国有化的苏联作协财产。共同体上层经过紧张讨论打算继续上诉，官司旷日持久，至今未决。伴随着苏联解体出现的三个作家组织，公开维护各自

团体的利益，“彼此间敌对是如此强烈和根深蒂固，以致所有要恢复原苏联作协并试图把他们再次统一起来、使之成为政府的统一战线的举动，迄今为止无不失败”<sup>②</sup>。

俄国作协、俄国作家联盟、作协国际共同体三个组织之间彼此矛盾，经常发生争吵，但与以往知识分子，例如斯拉夫派和西欧派在如何理解“俄罗斯问题”上产生激烈争论不同，现在这些组织只是表面上坚持不同的审美倾向和文化价值认同，实际上更多的是利益之争。而作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各自内部又各有冲突：

俄国作家联盟丑闻不断，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作协2000年退出；2001年底，诗人叶甫图申科向俄联邦总检察长控告属于“俄国作家联盟”的国际文学基金会总经理久鲁米扬不许基金会主席进入大楼办公，私自占领属于作家联盟的房产（《文学报》2001年末版）。

2001年谢尔盖·米哈尔科夫被邀请出任“作协国际共同体”执委领导人，主要工作是为该组织长达五年之久的利益分享问题奔波。尤里·邦达列夫及其支持者要求追究共同体前副主席A.拉里昂诺夫挥霍作家组织财产的责任，因为A.拉里昂诺夫把“罗斯托夫之家”悄悄地出售了（这是一座与列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有着密切关系的房产，1934年就归属于苏联作协），此举当然引起了作家们的愤怒，于是共同体向法院起诉，开始了耗时费力的诉讼。

俄国作协也是麻烦缠身。第十次代表大会之后，主席加尼且夫把大会决定诗人叶廖缅科不再担任《文学俄国》报主编的决定通报给俄联邦出版事务部；《明天报》（2000年9月第41期）和《苏维埃俄国报》（2000年10月21日）等媒体披露了大会表达的对叶廖缅科等人不信任情况及其任职期间的劣迹；《文学俄国》报编辑部和叶廖缅科则先后在该报上发表《弄虚作假》、《纪念虚假的作家代表大会一周年》、《背着作家》（2000年9月29日、11月3日）等文章指责会议失效、

<sup>①</sup>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Россия, 12 июня 1998.

<sup>②</sup> 关于尝试联合这两个组织的文献，请参见1999年11月26～30日、2002年1月30日至2月5日俄国《文学报》，对这种联合的论述还可参见[加拿大]舍尔德内曼：《俄国文学（1995～2002年）：在新千年的门槛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2004年英文版，第7～8页。

文学官僚使作协陷入泥潭。作协主席加尼且夫本身就不能服众，他少有文学业绩，苏联时代一直是文学领域的官僚，先后任《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社长（1968～1978年）、《共青团真理报》主编（1978～1980年）、《长篇小说报》杂志主编（1981年以来），他的创作基本上是俄罗斯帝国意识的表达，在后苏联所创作的《为了后代》、《俄罗斯》、《俄国不可战胜》等作品，缺乏叙述的深度和思想力度，文学声望并不高。

苏联作协作为苏联极权主义官僚机构在文学界的延伸，苏联尚在时，作协的运作就已显示出要瓦解的迹象，而后苏联到来后，在文学社会作用严重弱化、文学家地位持续降低的情形下，反而出现更多的人去组织不同的作协，如2006年仅莫斯科就有7个不同的作家利益集团。如果它们能够妥善地重新配置所拥有的社会声望、政治地位和文学影响力等资源，也是能为文学发展做出贡献的。例如俄国作家联盟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分别设有分支机构（有58个分会），这些地方分部分别有报刊《日与夜》（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光线》（伏尔加格勒）、《城市》（陶里亚蒂）、《作家报》（图拉）和《俄国的西方》、《波罗的海》（加里宁格勒）等22种，创办了与协会同名的出版社，出版一些有影响的作品，如《当代俄罗斯散文和诗歌：文选》（2009年）；该联盟还曾参与创办沃洛申奖和文学征文比赛、青年作家全俄会议，每年组织肖洛霍夫、果戈理和特瓦尔多夫斯基等杰出作家的纪念性研讨会，组织评审尤里·多尔戈鲁基国际文学奖，举办外省文学家晚会，和俄国的新闻工作者协会合作举行女作家创作研讨会，并在大中学、图书馆和教会组织小说、诗歌、文学批评和翻译等圆桌会议，是作协国际共同体、国际文学基金会、俄国文学基金会等组织的重要成员。但遗憾的是，上述组织如俄国作协、俄国作家联盟没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这些有意义的事情上面，而是主要致力于争夺团体利益，诱使很多著名作家耗费精力为各自组织的合法性和权力持续进行争斗，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文学生产力。著名的小说家和文学批评家亚历山大·阿达莫维奇1994年1月底就猝死在两派争夺文学基金会的法庭上。在著名作家奥列格·帕弗洛夫看来，没有一个作家组织是辛勤工作者的联盟，“目前

的作家组织是政治运动的分支。他们梦想的是重新拥有权力，恢复此前的特权。文学工作在俄国无异于辛勤劳动。（这些组织）不保护作者的版权，不去阻止让作家所得低于贫困线的出版垄断”<sup>①</sup>。

后苏联文学现象的突出特征在于文学的整体社会作用和作家的一部分地位发生了变化，但有些作家仍要“坚守”作协职位，许多著名作家和文学报刊参与甚至主导利益纷争，制造“文学事件”，不合时宜地以苏联式的宏大话语发言。结果，首先是耗费作家的文学生产力，同时伤害社会对作家的信任感和对文学的信心，更为严重的是中断了俄国知识分子探讨俄罗斯问题本土化和西方化之别的传统。实际上，包括米哈尔科夫在内的声望赫赫的作家，都很难在这样的利益集团中为提高文学家地位和改善文学境遇做出有效努力。作家组织的重组原本是文学作为文化市场一个领域的重新调整，是在继承包括利益和权力的历史遗产时所出现的行业分化，其本身并没有更多的社会政治效能，但当事者却用民族国家的修辞来表述这种行业内部纷争，如批评家拉克申发表的《结局、绝境、危机——俄国和俄国人在埋葬自己》（《独立报》1993年3月17日）一文说，近年来的变革要埋葬的不是某个人，而是给俄国的历史、人民、知识分子和文化做临终祷告，保守派和民主派之争已把西方的自由价值观和本土的思想推向极端，“不能想象没有自由的祖国，也不能想象没有祖国的自由”。其实作家在其时已经在加速远离社会中心，他们的内部之争没有更多的人关注，尤其与重建过程中全民寻求俄罗斯民族国家认同的潮流相矛盾，与希望自然平息因不同的政治参与所带来的纷争之期待相背离，更是对作家以个人语言的审美形式去表达俄罗斯民族国家认同的当代文学的进一步伤害。这种情况和作家队伍重组中前苏联主流作家缺失一道，共同挤压着后苏联文学的发展。

总之，后苏联到来和重建过程，曾经显赫半个世纪之久的作协，除了损耗那些当事者的文学生产力和文学声望之外，对后苏联文学发展的正

<sup>①</sup> Quoted N. Shneidman, *Russian Literature, 1995-2002: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New Millenniu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4, p.7.

面作用日趋缩小；当然，弥补历史缺失的回归文学浪潮、时代更替导致作家队伍结构性变化，也是加剧文学危机的临时性但却很关键的因素。当代重要的诗评家扎维亚洛夫在《和俄罗斯读者谈艾吉的诗》中（2006年）认为，诗歌在后苏联越来越不幸，不再能产生历史上的任何一种伟大诗人。不幸的不单单是无法诞生伟大的诗人，整个文学领域的境况都如此。而且，由于文学在俄国是民族认同之表达的重要方式，因而文学危机实际上也就是俄国社会重建的危机表征。2000年9月22日普京和索尔仁尼琴举行两个小时的会晤，后者明确告诉普京所担心的事——俄国正在遭受巨大痛苦，因为原有的文化空间被撕裂成碎片了。

普京执政之后虽然国力有很大提升，经济状况改观不少，却因为政治干预文学程度增加，文学危机整体上并未消解。从苏联到后苏联的文化转型中，因社会突变和文学界内部变化所激发的文学危机，其持续的时间长短、程度的加剧或缓解，不仅取决于调整政治和文化关系、文学市场化机制、社会关注文学方式变化等外部因素，更离不开文学自身改善——经由文化市场而去表达民族认同，宣泄民族主义情绪，是和后苏联俄国重建民族国家观念之危机的消除同步进行的，而这是另一个需要单独行文的重要论题。

（责任编辑 靳会新）

## Unfinished Cultural Transition: Three Crises of Post-Soviet Russian Literature

LIN Jinghua

**Abstract:** As a special in Russian culture, Russian literature in the post-Soviet period abruptly lost a powerful social function that lasted almost two hundred years. In this cultural transition, it has three crises in varying degrees. They are including: literature ranks have broken apart in the process of literature reconstructi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has been threw into disorder by lasting-long-time tide of regression literature, writer's associ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has become an interest group and hence affecting the literature products from the Soviet writers. These phenomena make twenty-year Russian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need fighting against literature crises to go into order. Up to now, this is still an unfinished transition process.

**Key words:** post-Soviet-Union; literature break apart; regression literature interferes literature process; function of writer's organization varies